

JINGJIXUE
FANSI

经济学反思

王东京 著

JINGJIXUE
FANSI

经济学反思

王东京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曹春

装帧设计：木辛

责任校对：吕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反思 / 王东京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8

ISBN 978 - 7 - 01 - 016602 - 5

I. ①经… II. ①王… III. ①西方经济学－研究 IV. ① F0-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2496 号

经济学反思

JINGJIXUE FANSI

王东京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数: 188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6602 - 5 定价: 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序 言

在将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前，我一连好几天为怎样起书名而纠结。原本是想用《经济学困惑》，可有朋友主张用《经济学悖论》，而责任编辑曹春博士又建议用《经济学反思》。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曹博士的建议好。是的，本书不单是写困惑，更多则是自己对经济学的思考。文能对题，最后定下来就用《反思》。

实不相瞒，为写本书我足足准备了二十年。1996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写专栏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名著、西方经济史，每周一篇，一气写了八年；后来转到《21世纪经济报道》写中国经济系列，也是每周一篇，又写了五年。于今想来，要是没有十三年专栏打底，恐怕不会有今天这本《反思》问世。

不知有幸还是不幸，当年我就读的中南财经大学并非名

校，但母校非常重视读经典。那时候教授上课常给学生背经典，考试也逼着学生背。记忆中大学四年似乎天天要背书，当时感觉真的很不幸。可 1988 年考入人民大学读博士，发现自己背经典的本领明显高人一筹；后来写专栏，引经据典得心应手，现在看却是因“祸”得福了！

这里要说的，是大学时为了考试读经典，免不了囫囵吞枣，到中央党校任教后才知自己对经典一知半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重读，这一次读得用心，整整花了两年时间。这两年不仅让我领悟到了经典的魅力，同时也对经济学产生了诸多的疑惑。不过那时年轻，初出茅庐，面对疑惑只是觉得自己蠢，没敢去怀疑经典。

2010 年，我的工作岗位有了变动，没时间再写专栏了，只好忙里偷闲整理之前尚未发表的论文。不成想，一边整理旧稿，脑子里对经济学的种种疑惑却挥之不去。于是灵机一转，我决定先弄清这些疑惑。这样又用了五年，一个一个问题研究并力求甚解。去年 8 月在《学习时报》重开专栏，这一年刊载的就是我近五年的思考成果。

相熟的朋友知道，迄今为止我出版的著作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讲解经济学原理；一类是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经济。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西方经济学不仅有不少理论相互打架；而且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现实。其实早在 30 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就承认，“经济学的某些重要命题还不能用事实证

实。”基于此，我对经济学的反思也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展开。

举例说吧：萨伊定律说供给可自动创造需求，而凯恩斯却说供给不能创造需求；魏克塞尔说利率是政策工具，而费雪却说利率不是工具；马歇尔说需求定律是基本规律，可又说“吉芬物品”是个例外。再对比中国的现实：“菲利普斯曲线”说低失业必导致高通胀，而中国今天低失业但并未高通胀；斯密说分工可提高效率，可时下中国的产业融合却势不可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首先是对某些理论命题提出质疑，同时也给出我认为正确的解释。当然我认为正确未必就正确，相信读者会有判断。为方便理解，这次与《反思》一同出版的还有我写的《经济学笔谭》。《笔谭》侧重介绍原理；《反思》侧重质疑与解析。要提点的是，若先读《笔谭》再读《反思》，对非经济专业读者也许会容易些。

余话不说，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于北京大有庄

提 要

政府与市场

资源配置有两只手

当年亚当·斯密有个形象的比喻，说资源配置有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市场无形之手；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政府有形之手。而且斯密说得清楚，资源配置应首先让看不见的手进行基础性调节；而在市场覆盖不到的地方由政府发挥看得见手的作用。

市场为何失灵

今天经济学家大多都认可市场失灵，目前的分歧在市场为何失灵？我看到的教科书有三点解释：一是信息不充分；二是经济活动有外部性；三是社会需要提供公共品（服务）。我不完全同意以上解释，至少我认为信息不充分与外部性不是市场失灵的原因，公共品会令市场失灵，但除了公共品，按要素分配也会导致市场失灵。

外部性与顶层设计

改革呼唤顶层设计，改革也离不开地方试验，可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到底怎样分工？从理论上讲，就是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说，计划与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交易费用：若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比市场配置低就用计划，否则就用市场。同理，改革选择顶层设计还是选择地方试验，归根到底也是要看交易费用。

政府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在政府与企业间究竟如何划分？经济学通常是从成本与收益两方面作权衡，而我则主张就从成本看。这不仅因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难以考量，而且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收益都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的成本。

谁是调结构的主体

调结构若由政府主导得有三个前提要成立：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关注市场；第三，行政调节要比市场调节更有效。这三个前提成立吗？政府并非先知先觉，不可能提前知道怎样的结构是好结构，因而不宜作为调结构的主导。

厂商与消费者行为

需求定律与吉芬悖论

价格与需求是反向变化关系：价格上升需求下降；价格下降需求上升。若用坐标图描述就是那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照理，这定律不应该错，可自从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吉芬悖论”后，学界便产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是需求定律究竟是否有例外？

最大化的选择规则

经济学的基本定律是需求定律，它描述的是价格与需求的关系，其中价格是约束行为的条件，需求变化是价格约束下的行为结果。同时需求定律作为分析工具也可用来解释人类的其他行为选择。该定律的引申含义是：人类行为选择一定服从特定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

创新驱动的体制安排

要推动创新，国家应重点资助科学研究与关系国家安全的高新技术研发，对一般民用技术研发机构应予断奶。不过为稳妥起见，不妨先设一个“过渡期”，分两步走：第一步，过渡期内财政仍拨给工资，但不再下拨课题经费；第二步，过渡期满研发机构即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国家不再拨工资。

产学研脱节的症结

目前国内产学研脱节，原因是发明人不关心科技成果转化。而所以如此，是因为产权界定缺位，成果转化不体现发明人的利益。美国的经验，联邦财政资助研发的专利历史上也曾归政府所有，那时美国专利转化仅 5%；而 1980 年“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后，则转化率一路飙升。

博导的功用：关于最大化的讨论

博导既非职务，也非职称，可为何国内大学要给教授评博导？思之再三，我想到的答案是博导对教授有激励作用。一个教授若不是博导，还不是最高级别的教授，于是为了评博导还得继续点灯熬油。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用目标激励代替督促，无疑降低了管理难度，也节约了管理成本，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设计。

成本与收益分析

利润究竟为何物

利润不是资本的报酬；也不是复杂劳动的报酬与财产权的报酬。利润究竟为何物？我的观点，利润是企业家的“租”。所谓“租”，在经济学里是指那种要素供给不变而收入可变的“收入”。众所周知，“租”最初出现于农耕社会，典型的“租”是地租，企业家“租”的定义也是由此而来。

从选择角度看成本

从选择的角度看成本可得出三点推论：第一，雇工的机会成本是放弃使用机器的收益，机器的收益越高，雇工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则机器代替人工是必然趋势；第二，选择传统能源的机会成本是放弃使用新能源的代价，若新能源更环保或者收益更高，则新能源替代

传统能源不可逆转；第三，投资甲项目的机会成本是放弃投资乙项目的代价，所以不能以投资成本衡量企业是否暴利。

产业融合定理

企业选择产业融合，交易成本高只是必要条件；另一条件是最佳产量约束。我们知道，企业生产某种产品是有最佳规模的，若超出最佳规模，边际成本会高于边际收益企业就会得不偿失。这是说：只有当交易成本升高，而同时产量达到最佳规模时企业才会选择融合。此为“产业融合定理”。

两问融资成本

目前学界认为企业融资成本高，主要依据是银行贷款利率高于企业投资利润率；而信托融资利率又高于银行利率。我认为作以上比较毫无实际意义。懂财务的朋友知道，企业贷款利息作为财务费用是计入成本的，利息虽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投资利润率，但只要投资利润率大于零，无论贷款利率多高企业也不会亏损。

为中间商正名

衡量中间商利润要从机会成本看。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作某项选择而放弃其他选择的最高代价。中间商选择贩菜，机会成本就是他放弃做其他事的收益。比如某人打工年收 9 万，而他放弃打工去贩菜，则贩菜的机会成本就是 9 万，若他一年贩菜的收入是 10 万，那么你认为他得到的还是暴利吗？其实，今天很多人不去贩菜，那是因为他从事的职业比贩菜更赚。

稀缺性假设与竞争

稀缺资源如何配置

稀缺的资源让谁先能得到，要看配置规则怎么定。现实生活里配

置资源的规则很多：竞价购买是一种规则；排队购买或者抓阄也是一种规则；投票决定也是一种规则。需要研究的是，面对这些规则我们该如何选择，或在何条件下选择何种规则。

市场竞争到底争什么

将竞争的理论分析引申到政策层面，有三点重要的推论：第一，如果希望市场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就得鼓励卖家竞争，为此政府必须改革妨碍竞争的体制机制；第二，鼓励买家竞争可提高配置资源效率，为此政府应充分尊重出价规则，照顾穷人是政府的事而不能推给市场；第三，定价事关买卖双方的权益，除了公共品，一般竞争品价格只能由供求定，政府无须干预。

追问马歇尔冲突

垄断的实质是“觅价”，若如此，则垄断不会排斥竞争。事实上为了取得高额利润，所有企业都有觅价（垄断）意愿，只是有的企业有条件觅价，有的企业无条件觅价，但今天不能觅价不等于明天也不能觅价。这样看，任何觅价者都有潜在的竞争对手，故垄断不仅不排斥竞争，还会带动竞争。

技术雇佣资本假说

凡勃伦在《企业理论》一书中预言，伴随技术不断进步，企业权力将逐步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技术阶层手中，企业由技术阶层控制，形成技术雇佣资本的趋势。我推断，出现这一趋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资本相对过剩；技术相对更稀缺。而可观察的指标是：利率低于通胀率，投资收益率低于利率。

不要误读价格歧视

价格歧视不同于差别定价，由产品与成本不同引起的价格不同是差别定价；产品与成本相同而价格不同才是价格歧视。价格歧视是中

性概念，是供给稳定而需求不稳定所导致的结果。对此政府当坦然面对，不必用行政手段干预。

供求均衡分析

怎样看均衡与非均衡

瓦尔拉斯与马歇尔分析均衡的方法虽然有别，但推论相同：即经济能否均衡关键在价格怎么定。从局部均衡看，若希望某商品供求平衡，价格要由供求双方定；从一般均衡看，瓦尔拉斯说存在一组价格可让所有商品出清。他讲的“一组价格”是指商品比价，而商品比价又以各种商品价格为基础，归根到底价格也是由供求定。

补贴农业的理由

农业比较收益低的原因究竟为何？这不仅事关政府补贴农业的性质，也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果认定是由于农业有自然风险，则补贴农业就是政府的善举，这样政府就既可多补，也可少补；假如是另有原因而且与政府相干，那么补贴农业就不能看作是政府对农民的照顾，补多补少应听听农民的意见。

消费者剩余由何而来

消费者剩余是分工带来的收益，若没有分工与交换不可能出现消费者剩余；从数量看，消费者剩余等于买方意愿价与实际成交价之差。实际成交价是市价，买方意愿价要受生产成本与边际效用的约束，其大小不可能人为改变，政府不可能通过价格管制扩大消费者剩余。

“性别平等”的经济视角

假若社会对女性择业是基于比较优势，那么判断某行业是否有性别歧视就不能光看男女比例，关键是要看是否有限制自由择业的制

度。若某用人单位明文规定只用男性不用女性，当然是性别歧视；若没有这种规定，该行业即便全是男性没有女性也非性别歧视。

逆选择的真实原因

较早关注逆选择的学者是格雷欣。在他所处的时代，黄金与白银皆作货币流通。格雷欣发现，当一种货币贬值时，另一价值较高的“良币”会被储藏；而价值较低的“劣币”却充斥市场。为何会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我的解释，所有逆选择皆是因为“价格锁定”。

产权假设与交换

科斯的产权含义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产权界定，他所说的产权不同于所有权。所有权是法权，指的是财产归属；而产权则是指除了归属权之外的其他三项权利：即使用权、收益分享权与转让权。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明晰产权并非是改变所有权，而是明确财产的使用、收益、转让权。这是说，明晰产权与所有权是否私有无关。

公有制何以产生交换

马克思曾明确讲：“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而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何以产生交换？我的观点是：马克思所讲的流通前提不是指生产资料私有，而是产品私有；由于所有权与产权可以分离，产品是否私有与生产资料归谁无关，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

从交换角度看分配

按要素分配是企业的分配原则，但进入到操作层面有一个难题，那就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参与分配的具体比例怎么确定？理论上讲，应该看它们各自的贡献，可我们怎知道不同要素的贡献呢？要

解决此问题还得从交换入手，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们各自的贡献，但通过交换却可以确定。

平均主义的产权推定

10 年前我赴云南沧源调研，时任县委书记余炳武是我旧识，我们进行了一次直问直答的对话。我问：沧源农民为何不能致富？他答：当地农民观念滞后；我问：何为观念滞后？他答：农民靠天吃饭，温饱即安；我问：老百姓为何不想致富？他答：习惯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我问：为何平均主义积重难返？他答：佤族群众从原始社会直过来，没有私产意识。

社会成本的内化路径

分配碳排权是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的重要一步，但仅此不够，政府还得允许碳排权进入市场交易。若没有碳排权交易，不仅社会成本难以内化，而且目前大量碳排超标企业由于无处购买碳排权得立即停产甚至倒闭，失业增加，难免会造成社会震荡。

最优配置方法

定义“公平”的困难

公平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由于人们的文化背景、利益取向、收入状况不同，对公平的理解也会大为不同，于是对公平很难作出大家都接受的定义。不过公平虽然难以定义，但公道自在人心，对不公平的事却很容易看得出，尤其对身边的不公平，人们的判断往往能高度的一致。

基尼系数并非收入差距

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并不是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虽包含收入差距，但主要是财产差距。比如有人说中国 20% 的人口拥有 80% 的财

富，这里的“财富”显然是指财产而非收入。若将基尼系数仅看作收入差距，那么只调收入而不调财产无疑是舍本逐末。

幸福感与收入差距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不仅来自收入，也来自人们比较的参照。对扶贫来说，政府当然应竭尽全力，但不可能让所有穷人一夜脱贫。学界当前要做的是引导人们正视差距并通过勤奋劳动缩小差距，而不是过度渲染收入差距、鼓励攀比，那样做除了助长仇富心理，对社会和谐有害无益。

政府补贴悖论

以往的政府补贴名目繁多：如住房补贴；家电补贴；农机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燃油补贴等，我们无须怀疑政府发放补贴的初衷，但效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如前几年政府为了资助穷人买房，拿出大量资金补贴建经济房。结果经济房穷人买不到，购房者多是富人，这样富人反而搭了穷人的便车。

从税负转嫁看减税

企业税负能否转嫁，关键在商品能否提价；而商品能否提价，又决定于需求是否有弹性。若我们把角度倒过来研究减税道理也相通：减税是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这种补贴会否转移关键在商品会否降价，若能降价，减税的受益者是消费者；若不能降价，减税的受益者是企业。而决定商品会否降价的因素，则是需求弹性。

公平分配原理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说，穷人的一块钱要比富人一块钱的效用更大，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均等化能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但也有学者认为分配不仅要兼顾公平也要注重效率，绝不可顾此失彼。于是卡尔多提出了“假想补偿原则”；弗里德曼提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

的“负所得税方案”。

“帕累托最优”的要义

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在某种既定资源配置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帕累托最优”的要义就一句话：只要不对市场实行管制，资源配置即可达到最优。反过来理解，若资源配置未达到最优，则必存在市场监管。

经济总量均衡

质疑凯恩斯“恒等式”

凯恩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恒等式：储蓄等于投资。我认为“储蓄等于投资”并非铁律，也非总供求均衡的唯一条件。关于总供求均衡，我赞成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社会资本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部类，他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必须坚持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两个平衡。

萨伊定律的困惑

萨伊定律说：人们卖商品是为了买商品，即为买而卖，这样一种商品的出售，就意味着对另一商品的购买，于是供给可自动创造需求。而凯恩斯指出，在物物交换时代萨伊定律能成立；但当纸币出现后萨伊定律就站不住了。凯恩斯的理由是货币可以储藏，当人们卖出商品后如果不马上买，商品就会过剩。

菲利普斯曲线的疑点

菲利普斯通过分析英国 1861 年至 1957 年工资与失业的数据发现：名义工资率变动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后来萨缪尔逊与索洛以菲利普斯的研究作基础，用通胀率替换工资率，提出了通胀率与失业率

也是反向关系的推论，并冠名为“菲利普斯曲线”。我认为菲利普斯本人的结论是对的，但萨缪尔逊与索洛的推论却错了。

奥肯法则不可照搬

阿瑟·奥肯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短期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关系，而且比值为1:2。意思是说，失业率每上升1%，经济增长率会下降2%；若经济增长率提高2%，则失业率会下降1%。于是学界有人将近几年国内经济下行看作为失业的代价。我不同意这看法，经济增长下降失业率有可能上升；但失业上升经济增长却不一定下降。

产能过剩的隐因

产能过剩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官员追求GDP；也不能归咎于预算软约束。换位思考，要是你在地方为官，是否也希望造福一方？平心而论，若这些年地方官员不重视GDP，中国怎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然目前的产能过剩，也不能排除有追求GDP的因素，但这只是表象，其实背后还另有隐因。

“分享制”为何行不通

威茨曼被称为自凯恩斯之后提出有效对付失业办法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分享经济》的核心观点就一句话：企业收益要由劳资双方按比例分享。虽然学界对此赞誉有加，可他的理论在西方却行不通。究其原因，受选票政治的束缚是一方面；而最难逾越的鸿沟是最低工资法。

财政政策与稳增长

“李嘉图等价定理”之争

李嘉图等价定理说：政府筹措资金对内发债与增加收税，其效果